

##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教授

## 总统更迭对美国高等教育影响几何

■郭英剑

近日,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只需等待两个月。在高等教育界,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他在重掌大权之后,将会出台怎样的教育政策,这些政策又将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怎样的重大影响。而一些主流媒体已经在预测特朗普上任后可能对高等教育采取的重大举措。

## 预测一:废除联邦教育部

《华尔街日报》11月12日报道,特朗普计划重塑美国教育体系,承诺加强对教育资金和课堂教学的控制,遏制他认为的大学左倾倾向,甚至提议解散联邦教育部。

事实上,特朗普在此次总统竞选期间,曾多次表达废除联邦教育部的意愿。比如,6月22日,他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基督教保守派团体集会上发表演讲称,如果自己胜选,其政府将组建一个工作小组,以确保全美各地的中小学都会教授正确的英语和数学课程。他说,我将废除(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把这一切工作回归各州,各州可以进行个性化教育,带着对孩子的爱去做教育工作。

特朗普想要废除联邦教育部的依据,主要源于他对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过度干预的不满。他认为联邦教育部的存在导致了繁文缛节和高昂的教育支出,削弱了地方对教育的控制权。

一旦将教育决策权下放到各州,有可能对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何种影响?

首先,教育质量差异加大。美国各州在教育资源、政策和管理能力上存在差异,该政策可能导致教育质量不均衡。其次,教育公平性受影响。联邦教育部目前负责管理针对低收入家庭和特殊需求学生的资助项目。联邦教育部被废除后,这些项目的管理和资金分配无疑将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教育公平性。再次,课程标准多样化。由于各州可能制定不同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这就会导致全美范围内的教育内容和质量不一致。最后,高等教育政策会有变化。联邦教育部目前管理联邦学生贷款和财政援助计划,部门被废除后,这些职能可能转移至其他机构或由各州管理,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贷款和资助获取方式。

当然,是否废除联邦教育部还有待观察。但无论是否废除,特朗普的高等教育政策一定会对美国的教育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 预测二:DEI项目面临厄运

所谓“DEI”,即“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的简称。作为美国很多高校近年来推行的一项重大举措,DEI项目旨在通过政策和实践,促进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公平性,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尊重。

这其中,“多元化”关注个体之间的差异,包括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强调接受并尊重多样性;“公平”则致力于消除制度性障碍,提供公平的资源分配和支持,以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机会和成就差距;“包容”则强调创建一个尊重和接纳所有人的环境,使每个人都感到被支持、能参与其中并获得归属感。

尽管DEI的理念很好,但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诸多争议,甚至导致了社会、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对立。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DEI提倡公平而非平等,即根据不同群体的需要分配资源,而非提供完全相同的待遇。批评者认为,这可能导致对某些群体的优待,以及对其他群体的“反向歧视”。比如,在招生中

美国高校群体庞大、受众面广,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相关政策无论何时出台,都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由于特朗普的教育理念与美国许多高校的现有政策和理念完全相左,两者的关系极为对立,高校将面对巨大的困难与挑战。



二是国家性认证机构。其主要负责职业学校、技术学院和一些特定专业的认证,如职业学校与学院认证委员会、职业教育委员会等。

三是专业性认证机构。其专门认证特定领域的专业课程,如法律、医学、商科等,包括法学院协会认证委员会、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等。

毫无疑问,这些认证机构需要通过评估大学的方方面面,以确保它们达到了一定的质量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学术质量、学生学习成果、师资力量、资源与设施、财政问题与治理、学生服务等。

起源于19世纪末、有着上百年发展历史的美国大学认证机构,在维护大学教育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高通过率 and 缺乏严格的后续监督等问题。这使得不少人开始质疑其有效性。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批评这些机构未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和公平性,认为其政策过于宽松且意识形态化,因此主张改革认证体系。其主要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解雇现有的认证机构。特朗普批评现有的大学认证机构要求过于宽松,凡是申请认证的机构大都可以轻松通过。为此,他提议解雇这些机构,重新审查并选择新的认证机构。

其次,设立新的认证标准。他主张新的认证机构应遵循特定标准,包括捍卫美国传统和西方文明,强调课程内容应体现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观;保护言论自由,确保校园内的多元观点得到表达和尊重;废除冗余的行政职位,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降低学费成本;实施入学和毕业考试,确保学生在入学和毕业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

一旦这些措施得以实施,将会对现有大学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现有大学的认证资格需要重新评估,它们需要重新申请认证,符合新的标准才能继续获得联邦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大学的课程和行政机构需要调整,为满足新的认证要求,它们可能需要修改课程内容,减少或调整行政职位,特别是与DEI相关的部门。此外,大学还会面临资金和运营压力。如果未能通过新的认证,它们可能失去联邦资金支持,面临财务困难,部分院校甚至可能关门歇业。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教育只是其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之一,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因此,其相应的教育政策应该不会立刻推出,至于究竟何时出台,出台后的制度力度有多大、能在多大层面上加以体现,这些都还是未知数。不过,美国高校群体庞大、受众面广,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相关政策无论何时出台,都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由于特朗普的教育理念与美国许多高校的现有政策和理念完全相左,两者的关系极为对立,高校将面对巨大的困难与挑战。

美国高等教育未来何去何从,人们尚需拭目以待。

美国高等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私立大学多于公立大学;二是学校的声誉需要认证机构的评估。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截至2020—2021学年,美国共有3931家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公立大学约占34%、私立的非营利性大学约占40%、私立的营利性大学约占26%。

美国私立大学的建立通常只需获得州政府的批准,不需要联邦政府直接授权。但一所大学学术声誉的建立、质量的保障,则需要大学认证机构认可。

这些认证机构主要由非政府组织组成,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区域性认证机构。这是最权威和广泛认可的认证类别,覆盖特定的地理区域,主要包括中部各州高等教育委员会、新英格兰高等教育委员会、南部学院与学校协会委员会、西部学院与大学委员会,以及北部中部高等教育委员会。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首创。这种“办学形式的创新、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

2008年,福州大学在国内首次提出“走区域特色创业型大学”的办学理念,打破了仅仅围绕知识的逻辑建构学术的传统大学模式,更注重满足社会的利益及需求,以变革、创新、发展为已任,使大学在基于协同的科技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学校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创造了校企合作“紫金模式”、校地合作的“晋江模式”以及校地企合作的“泉港模式”。近年来,学校多点突破,全面发力,系统推进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激活力。

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教学是高校的基础工作,也是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之举。学校大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开展通识教育、大类教学、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积极探索书院

制教育。推进本硕博贯通培养,实施大师引领、大项目牵引、大平台支撑、大周期镶嵌的本研贯通培养模式,构建卓越拔尖新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五育融合协同机制,改革学生综合评价机制,构建学生全面发展五育并举体系。

深化人事制度综合改革要畅通人才发展通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人才是第一资源,学校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引进体系,加快建设区域高水平人才高地和集聚人才平台。分类、精准制定绩效工资改革方案、职称评聘方案,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让高校各类人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深化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要激发创新发展活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科技创新能力较量的背后是制度体制的比拼。学校深入推进科技体制综合改革,围绕打造“大平台”,加强科研机构调整改革,以“分子工程+”研究院、医工交叉研究院等新型研

##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社会对大学影响的力度日渐增强,校园的围墙、栅栏或“护校河”之类的物理隔离似乎远抵不过实质性的“社(会)”“校(大学)”联通需求,大学的社会化几乎成了无法阻挡的趋势。这其中正面的影响固然够多,但反面影响亦不能等闲视之,大学教育“代理化”倾向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代理”,是与“亲力亲为”相对的概念。大学教育的“代理化”是指大学师生不再为教学、科研或课程学习而亲历亲为,他们往往会以各种形式寻求他人的有偿性帮助,让后者替代完成本属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业。

现在很难确定类似“代理化”的倾向肇始于何时,但至少在十几年前,大学生中便出现了代做作业、代从食堂打饭的现象,进一步的行为则是课堂笔记的贩卖与购买,及近几年的代取外卖、快递,以及从“论文工厂”购买(代写)论文等。

教师的“代理化”表现也并不输于学生。随着“重科研、轻教学”政策的推行,教师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可以说进入了低谷,由研究生“代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一些院校,每年的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的监考人员培训时几乎看不到教师的身影,倘有几位年纪稍长的教师,在一众青年学生(研究生)的衬托下显得突兀而孤单。

尽管教育管理部门三令五申,要求正高级职称教师每年必须承担一门本科生课程,但现实中仍然有不少教授在“打擦边球”,其领衔开设的课程,仅在首次课上讲一回“引言”,最后一次课上作一回“总结”发言,中间环节全由青年教师或研究生代劳,并且美其名曰“教学团队通力合作”。面对学术“大咖”和各类“人才”,大量院校都无法真正落实上级部门的管理要求,颇有些“令”不上“大咖”和“人才”的难言之隐。

与课堂教学远离本科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科研工作倒是很有些贴近研究生。虽然研究生跟导师做课题似乎是“国际惯例”,但导师与研究生的角色都在发生变化——导师成了课题的收揽者,研究生则成了研究者或实际操作者。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代理关系,即由导师提出设想,具体的操作完全由研究生代劳。这种代理关系中,多的是技艺(能)和效率、效益,少的则是人格的影响,师生之间的实际距离很近,但心理距离很远。

像中小学一样,当下的大学也在向社会让渡代理权。大体来看,知识巩固和强化的义务、考研复习的工作被“外包”给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知识的传授也被部分托付给各大公司或平台开发的人工智能(AI)软件。

大学的“代理化”还不止于此。多年来,颇受争议的“非升即走”政策之所以走样和异化,也与“代理化”对管理思维

## 大学教育『代理化』现象值得关注和警惕

的影响有关。

因为“代理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发包”形式。学校作为“甲方”,对于“乙方”(“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师)很难负起真正的责任,进而生出培养之心。因此,在“非升即走”的政策中,能看到的只有数字化的量化指标,完成指标就留下,否则就走人。这是国内“非升即走”淘汰率过高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看,在现代社会分工细化的情况下,各种代理职业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那句著名的流行语——“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简言之,它更适用于社会的某些行业、企业和个人,而未必适合于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

因为大学本身就是以“专业化”为特征的,而“代理化”的实践者却首先把自己排除在“专业”之外,并试图凭借“代理”伪装成“专家”。因此,“代理化”模式下,培养的只能是“科研承包商”。在课题结项时间的压力下,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完成任务”或达成指标,而不是研究成果的探索意义。这样下去,“专业化”将成为打工者的标签,致力于“专业化”意味着陷入为“科研承包商”打工的泥潭。

实际上,大学的“专业化”只不过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专业化”的目标始终是“人的教育”。学生正是在专业学习中培养思维和锻造人格的。而这一“学习”的前提条件就是“亲力亲为”。学生是通过动脑和动手直接参与的过程成长的。教师也一样,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往往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教学内容,并且不断在学生的反馈中深入思考。换言之,教育总是通过师生的“亲力亲为”而产生效益的。

因此,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师生之间直接对话、讨论或者辩论。“代理化”后,师生不再有机会在课堂上一近距离接触,实验室中师生的角色也不再是“老师”与“学生”。如此这般的“作为”,还怎么谈得上“教育”?

## 福州大学:东南强校的改革奋进之路

■陈国龙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如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水平人才支撑和高质量的创新保障?这是高校面临的改革必答题。

自建校以来,福州大学就有着改革创新的基因,就有着敢闯新路的传统。一代代福大人始终心怀“国之大事”,勇于自我提升,敢于自我革新,奋进在建设东南强校的改革道路上。

高校深化改革要心怀“国之大事”,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为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以“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着眼长远看教育”的宽广视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福州大学的创校史是一部改革奋进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积极探索联合办学新路,与国家相关部委开展联合办学,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首创。这种“办学形式的创新、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

2008年,福州大学在国内首次提出“走区域特色创业型大学”的办学理念,打破了仅仅围绕知识的逻辑建构学术的传统大学模式,更注重满足社会的利益及需求,以变革、创新、发展为已任,使大学在基于协同的科技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学校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创造了校企合作“紫金模式”、校地合作的“晋江模式”以及校地企合作的“泉港模式”。近年来,学校多点突破,全面发力,系统推进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激活力。

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教学是高校的基础工作,也是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之举。学校大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开展通识教育、大类教学、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积极探索书院

制教育。推进本硕博贯通培养,实施大师引领、大项目牵引、大平台支撑、大周期镶嵌的本研贯通培养模式,构建卓越拔尖新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五育融合协同机制,改革学生综合评价机制,构建学生全面发展五育并举体系。

深化人事制度综合改革要畅通人才发展通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人才是第一资源,学校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引进体系,加快建设区域高水平人才高地和集聚人才平台。分类、精准制定绩效工资改革方案、职称评聘方案,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让高校各类人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深化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要激发创新发展活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科技创新能力较量的背后是制度体制的比拼。学校深入推进科技体制综合改革,围绕打造“大平台”,加强科研机构调整改革,以“分子工程+”研究院、医工交叉研究院等新型研

发机构为基础,深入探索建立高等研究院,全力打造高水平、高投入、高产出的“三高”学术特区。围绕争取“大项目”,优化重大科研项目组织机制,充分运用“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赋予科技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围绕培育“大成果”,深化科研激励机制改革,让高校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专心育人。

深化成果转化机制改革要坚持做“有用的科研”。高校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在此背景下,学校坚持做“有用的科研”,充分依托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积极参与打造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深化专利运用机制、专利转化利益共享机制、学科性公司孵化机制等改革,探索“福大+名企”发展模式,使自主转化成为学校科技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福州大学党委书记)